

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

陈支平*

〔摘要〕 根据台北芦洲李氏家族等所收藏的一批尚未为人引用的契约文书,对日据时期这一区域的土地赋役关系进行了个案的分析。日据时期在高压政策之下,民间的土地占有情况及其赋税负担,都受到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民间的土地物产交易以及交易的契约形式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来的影响而有所变化。然而,台北芦洲的民间土地关系毕竟是从一千多年来大陆土地关系中衍生出来的,错综复杂的乡族关系和共有财产关系,并非外部强力所能彻底改变的。因而,乡族的共有财产关系就成了日据时期土地关系的管理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关键词〕 契约文书 日据时期 芦洲 土地关系

2000年春天我在台北芦洲作田野调查的时候,搜集到一批尚未为人引用的民间契约文书,其中大部分是李氏家族的契约文书。根据这些文书,我曾写成《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一文。日据时期,台北农村的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者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针对某个具体乡村的土地关系进行细部的考察,尚不多见。本文准备再次根据李氏家族的这批契约文书,并且结合这里发见的其他家族的契约文书,对于日据时期的芦洲土地赋税关系,作一个案的分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明治28年)以后,台湾进入了日本占据统治的时期。为了实行对台湾社会的有效统治,除了在台湾推行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包括许多高压措施之外,针对清代中期以来台湾基层社会土地关系复杂、租税不清、册籍混乱的局面,从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开始,日本台湾当局颁发命令,在全台实行土地调查,落实租税。当时有关土地调查的晓諭文书这样写道:

照得本岛田土之制,从前无根册绘图完全留存,虽旧政府曾经清丈而但为征粮起见,是以簿册所登明者田土之形状及地势之宽窄而已,至丈量方法绝少精详,历年田园交加变换业主之权,每不能自保全。我帝国政府有见及此,故于明治三十一年八月间颁发台湾地籍章程并台湾土地调查章程,欲用精良器械文明田土,寸土无争。而其调查方法等项悉载在章程内明白,其或敢捏造谣言蛊惑众心不遵土地调查章程者,断以国法论罪,即将业主之权一切归属于官,不稍宽贷。……

计开应遵要项:

- 一凡申告土地者应从所举委员办理清丈田土一切事宜
- 一凡申告书内应记业主真实姓名
- 一凡为业主并官租地之佃户须先写申告书于未到地踏查之时,经由委员呈缴土地调查局派出所。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一凡田园在典者要将业主典主各姓名联写申告书内详报。

(下略)

在上引晓谕文书及日本台湾当局的一系列土地调查文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调查的业主必须是真实的姓名。因为只有出具业户的真实姓名,才能有效地杜绝以往那种虚名诡寄、挪移隐匿的痼弊,真正达到田随户转、赋由田出的效果。应当说,日本台湾当局在明治三十一年所推行的土地调查,除了在丈量的技术方面较为先进之外,其他的许多条文,与光绪年间刘铭传所推行的清丈问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个低效率和名实不相符的政治,任何良好的政治经济改革条文,在施行的过程中没有不大大走样的,即使精干如刘铭传,也无法扭转中国政治体制上的这一颓势。而日本政府以武力占据台湾,推行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统治政策,讲求行政效率,故而明治年间的这次土地调查和清理地租赋税的运动,取得了比较彻底的效果,据江丙坤等人的研究,到了日据大正年间(1912 - 1926 年)台湾在册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日据之前的一倍以上。

从和尚洲的情景来看,其土地调查的效果也是如此,那些并无实际人物的土地虚名代号,已经不复存在,如芦洲李氏家族的以往所沿用的“李长利”,以及其他家族的所谓“李合发”、“李合记”等等的名号,断然不能再出现在日本台湾当局的土地册籍上。从现在所见到的李氏家族的契约文书中,仍用李长利名号购置土地的契约文书截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明治三十二年)。其后该家族与他人交易土地等物产,只能以长子李灯辉及稍后的乡绅李树华的名字出现,而再也不能以“李长利”的名字进行交易。如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 年)和尚洲土地调查完成之后所颁发的“土地台帐誊本”中,重新登记的业主就是李灯辉,而不是李长利。再者,民间进行土地交易后须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并且尽快取得土地契尾。如李氏家族向陈当、陈逞购买一份土地是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而契尾的颁给时间是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基本上是在土地交易之后立即就要向地方政府上报,不得任意拖延。相比之下,清代中后期和尚洲民间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契尾的登记往往是一拖再拖。如我们曾见到道光三年(1823 年)和尚洲李岩、李千兄弟购买杨君德的埔园一所,而其契尾的颁给时间却是道光十年(1830 年)七月;田野美李氏家族曾用李长利的名义在光绪十七年(1891 年)向王秋氏购买埔园透田一所,其契尾的颁发时间也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 年)十月。土地交易与颁发契尾之间的时间越长,本身就说明了这项制度的执行很有问题。从民间交易的各方来说,最好是不用去官府登记领取契尾,则土地的私下交易和隐匿就更加方便。明清以来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其他地区民间存在的大量没有契尾的所谓“白契”,就是这种制度名不符实的实物体现。但是日据台湾当局经过雷厉风行的土地调查和清理租赋之后,台湾社会长期以来那种土地与业主、业主与租赋不相吻合的情况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改变。

即使是以往最容易混淆业权、规避租赋的民间家庭分析继承等仪式过程,日据台湾当局也予以比较严密的控制。一个家庭的分家析产,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单纯地属于个人的行为,而是与整个社会管理相联系的。因此当某一个家庭进行分家析产时,必须到有关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去报备和重新登记户属关系,而重新分配之后的财产归属,也很快在地方当局的册籍中体现出来,如我们见到大正六年(1917 年)和尚洲李烟树立“子孙系统证明愿”,并得到和尚洲区长蔡学韬印鉴认可的文书,就十分清楚的记述了该家庭的户属继承关系。像此类亲族子孙系统及其来往田地财产以及职业等等变动的登记和证实,已经成为一种严格的制度。这种制度得到严厉而切实的执行之后,民间的户籍关系、土地关系、租赋关系自然就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曾见到日据时期明治四十年(1907 年)和尚洲李连凤等人的分家文书,其中对于土地财产的分析记载就十分明白了,该分家合约字如下:

全立阉分合约字人李连凤、李水丛、李大鑫、暨侄李桔林等，有全承四房叔清晃祀业，址在芝兰二堡和尚洲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一则烟七分四厘一毫正，历管无异。实欲敦香裡于昌炽也，特恐不分经界靡有指归，爰是鸠集分约，先踏出壹尺五寸阔，付水丛、大鑫掌管以贴其中先茔，余概付连凤、水丛、大鑫、桔林四房并大均分。此系至公无私，自今以往各业各管，务要恢宏绪业，扩充门楣，则我先人在天之灵，与夫四房叔清晃亦必为之含笑也已。口恐无凭，笔则有据，即立阉分合约字一样四纸，各执一纸以为存照

谨将条目开列于左：

一踏出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烟壹尺五寸阔付水丛、大鑫二人对半掌管，以贴该烟叁穴风水，此乃两愿，不得混沾声明炤。

一连凤应得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西畔烟一段，东至桔林烟，西至李家烟，南至杨家烟，北至路中并李家各为界，四至界址明白，年配纳地租金贰円叁钱七厘五毫炤。

一水丛应得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东畔烟一段，东至贍业，西至大鑫烟，南至杨家烟，北至路中并李家各为界。四至界址明白，年配纳地租金贰円叁钱七厘五毫炤。

一大鑫应得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东畔烟一段，东到水丛烟，西桔林烟，南至杨家烟，北至路中并李家各为界，四至界址明白，年配纳地租金贰円叁钱五毫炤。

一桔林应得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西畔烟一段，东至大鑫烟，西至连凤烟，南至杨家烟，北至路中并李家各为界，四至界址明白，年配纳地租金贰円叁钱七厘五毫炤。

再批明言约贍业印契壹纸、眷本壹纸、新约字壹纸、嗣业四房司单壹纸、眷本壹纸、丈单壹纸、新约字壹纸，议交五房财福收存，要用之日取出公看，再炤

李寅东再批。

族长并秉笔人 李寅东 房亲人胞叔 李财福

明治肆拾年丁未叁月 日

全立阉分合约字人 李连凤 水 丛 大 鑫 桔 林^⑤

在这纸分家文书中，四房各分得田业、界址、地番以及所应承担的地租金，都十分清楚地记载在上面，这与日据以前民间分家时模糊记述的分家阉书有所不同，因为这时的私人分家，其财产的变动情景是要上报地方当局并登记在册取得合法证书的。我们在芦洲就曾见到过这种因私人分家而报备政府所取得的“共有物分割证”，该证书如下：

共有物分割证

陈能通、陈火生等共有之左记土地，今般相互协议，照左记分割，日后永无异言。兹将共有物分割取得土地表示列左：

新庄郡五股庄更寮字洲仔尾

貳百貳拾柒番之壹

一田壹分六厘叁毫六丝。

全所貳百叁拾四番

一田壹分七厘壹毫七丝。

右所有权陈能通取得。

新庄郡五股庄更寮字洲仔尾

貳百貳拾七番

一田九厘四毫四丝。

全所貳百叁拾四番之壹

一田八厘七毫八丝。

右所有权陈火生取得。

在共有物分割证壹样貳纸,各执壹纸存照。昭和六年叁月拾六日

共有物分割合约人 陈能通 同 陈火生
立公人 陈西岭^⑥

陈能通、陈火生兄弟取得这份“共有物分割证”,还须交纳一定数量登记金的。故在此证书的右上角还贴有交纳登记金的印花票据。而在中国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的朝代中,作为民间私有的分家析产文书,无论是从政府的法律或者是民间的习惯法上,是没有必要到官府及其相关的管理机构去登记印证的。

日据时期虽然对于台湾地区的户籍、田地财产及其交易、转移、继承等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是由于民间家族组织的存在,家族组织所共有的物产也仍然比较普遍的存在,尽管说日据台湾当局强调拥有这些公有物产的家族组织等,必须推举具有真实姓名的族人作为这些物产的代表人,但是这些家族公业的管理和运作,仍然存在着某些无法通过政治行政进行直线管理的方面。这些家族公业虽然有其真实姓名的代表人与日据台湾当局发生直接的联系,但其内部的经营、管理、分配等,却依然是遵循着传统家族制度的那一套规范,而这些内部的运作即使是日据台湾当局也是无法对其进行十分有效的了解和干预的。如我们前面所引的李连凤、李水丛、李大蠢、李桔林等兄弟叔侄的分家合约文书,虽然都记载清楚各自所分得的田地物产以及所承担的租税等等,但是其中“踏出楼仔厝庄二〇四地番壹尺五寸阔,付水丛、大蠢二人对半掌管,以贴该厝叁穴风水。”这里所踏出的壹尺五寸土地,没有附带地租金,其地租金显然已经分摊到分家的四房之中了。这种现象说明在这些家庭的分家过程中,其公业部分依然存留有某些田地与租金税课相为脱离的情况。再举和尚洲陈氏家族的情景,有陈火生、陈火用、陈锦溪、陈添福兄弟叔侄四人于日据大正九年(1920年)分家,其所分得的财产中,就仍然有不少公业,该阄分合约字略云:

全立阄分合约字人陈长房火生、次房火用、叁房锦溪等兄弟三大房,窃念先父在日有抱养媳妇一口李氏查某长大,招赘与陈金宝入门结为夫妇,偶有生下长子名添福等,缘我兄弟甥四人,……不如自此分家,同请公人族长到家协议,悉将承祖父遗下建置之物业,先抽出原充仍为长孙之额,又抽出公业轮流,以及养贍连完婚诸费,其余业产以及家俱畜类等件,各配踏分明,作四份均分。今当祖先神前焚香拈阄为定,系是造化凭阄掌管,日后子孙不能争竞长短。自分以后,各宜和好安分守己,国税摊纳,公务共理,不得推诿。此系至公无私,各房意愿,各无后悔,口恐无凭,今欲有凭,全立阄书合约字壹样式纸各执壹纸永远存照。

今将所分条目开列于后:

一批明更寮庄土名洲仔尾第貳五四番一田壹笔,又全所第貳五九番一田壹笔,又全所第貳百六拾番一田壹笔,又全所第貳百六拾番之壹一田壹笔,计共四笔,仍旧以为充长之资,以付现在长房火生掌管,别房不能争端混较,合批明伸照。

一批明更寮庄土名洲仔尾第百貳拾番一田壹笔,又全所第百貳拾番之壹一田壹笔,计共貳笔,与陈春等、陈振阵共业,将分应得壹半在北畔,均为公业,每年应作四份各房轮流,以做为亡父万兴夫妻二穴坟春秋祭献币资,火生应得辛酉年,添福应得壬戌年,火用应得癸亥年,锦溪应得甲子年,其余照顺序每年依例而行,合批明伸照。

.....

一批明更寮庄土名洲仔尾第百貳拾五番一田壹笔,及全所第百貳拾五番之壹一田壹

笔,计貳笔,乃是先父在日与陈水仙、春等、根阵四人分爨之时踏作公业轮流,依照每年应得之额按作四房摊分,火生应得戊申年,添福应得癸未年,火用应得丙寅年,锦溪应得己巳年,其余依例照顺序而行声明炤。

.....

一批明抽出更寮庄土名洲仔尾第八拾叁番之内柑粒壹个年貳百斤,限自大正九年庚申起至全拾叁年甲子止,共伍个年,每年至拾貳月年末之日交付添福收入清楚,其余乃是火生兄弟三人之额,合批明伸炤。

.....⑦

在这份分家文书中,上代人的公业,至父辈时已经是与他人轮流掌业,而到陈火生叔侄分家时,又把这些轮流掌管的公业再细分为四份。如此复杂的公业业权关系,恐怕连日据台湾当局未必能够完全掌控清楚的。所以日据台湾当局遇到此类家族公业交易时也颇为头疼。我们曾见到一些有关和尚洲陈头兄弟出卖公业给陈成兴的文书,该交易双方在完成土地买卖契约手续后向相关机构登记纳税,就因为这些土地原属于家族公业,为了杜绝日后家族成员的物产纠纷以及产权不清的纠纷,只好把该公业所有者一并叫来,各署一份领收证。该领收证有如下列:

领 收 证

一金百九圓也,但同年十月一日再领收金四十一圓也。

左之金额系拙者所共有之业,只(址)在兴直堡更寮庄土名洲仔尾百六拾叁番之建物敷地全部,并全所百貳拾番之田,百貳拾番之壹田持分貳分之壹,以上计叁笔。但建物敷地外西向之菜园壹段,并寮屋浮沉砖石门窗户扇以及草坪竹围等件,以上共计价格金七百五拾圓,卖渡与贵殿。而百貳拾番之水田貳笔,亦系共有之业,因土地调查之时,仅报拙者一人之名义,今般以上土地全部卖与贵殿,共业价金七百五拾圓,按作五房分摊,每房应得业价金壹佰五拾圓。拙者一房份之额,仅领收前记之金圓,余候至本年冬至日凑足清楚。决无异言,口恐无凭,时立证书壹通,依而如件。

大正七年 月 日

大加纳堡三板桥庄土名莉仔埕三十七番地

陈头(印鉴)

陈成兴殿

在这些各执一纸的领收证中,都提到这份出售给陈成兴的五房共有田产物业,在明治三十年代土地调查之时,仅报陈头一人之名义。这在当时进行土地调查时,强调要有真名实姓的族人来作为代表人去申告登记,已经达到了土地物产落实并加以课征租税的目的。但是这些公业的业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公业可能进行交易、分析和继承,而当初登报的公业代表人可能会谢世,如李氏家族的代表人李灯辉在土地调查过后不久就谢世一样,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据台湾当局对于民间家族公有土地物产的管理措施,在这方面的漏洞就显现了出来。如上举的领收证,陈头、陈云梯等五房兄弟叔侄出售的公业,不仅其本身的所有权属五房均分,而且其中的水田壹笔,又与其他人所共有,这五房兄弟叔侄仅有这份水田“持分貳分之壹”。这种多层交错的物权关系,远不是在日据台湾当局的册籍中所登记的“陈头一人之名义”所能解决的。因此可以说,日据时期对于台湾民间家族公共土地物产等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大概是日据台湾当局对于台湾社会经济进行管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吧。日据台湾当局曾经试图瓦解分化这种由中国传统社会而沿袭下来的台湾民间家族组织,显然与这种家族组织之不利于强化日本人的统治不无关系。但从另外的一种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族制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家族组织,有着比较根深蒂固的延续力,它的演变和转型,并不是一种突然的事变所能截然切

断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时段的渐进转化的过程。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日据时期日本台湾当局对于户籍、田地和租税的管理和控制还是达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这是自清代中期以来清朝台湾地方官府试图切实清赋而一直无法做到的事情,而到了日据时期在外力的管制下实现了。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据时期日本台湾当局十分重视对于土地、户口、租税等变动情况的登记落实,这又使得台湾地区沿袭了近三百年的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签订形式及文书格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从中国民间契约文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至少从宋代以来,民间土地等物产交易时所签订的契约文书格式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因此在明清时期,各地还出现了不少关于如何签订契约文书及各类契约文书格式的书籍,以方便民间仿效抄用。由于中国内陆省份没有出现台湾地区这样的日据时期严密的清赋运动,故而内陆省份民间的契约文书签订格式,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逐渐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山林等物产已属国有,民间无法进行土地所有权的交易,土地交易契约文书的签订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据我们从福建各地调查的情况看,民间在进行其他一些物产的交易过程中,私下所签订的契约文书,还依然是沿袭了明清以来的那种格式。但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区就不同了。一方面日本台湾当局施行了严密的落实土地租税政策,民间私下交易土地山林等物产,必须经过政府的认可。另一方面出于日本统治的长期目标考虑,地方政府在办理民政、行政等事务时,基本上是引进了日本国内的通行文本格式,这就不能不使台湾民间在签订各类文书的过程中,受到官府文书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形式,去适应新统治者对于民政、行政管理的需求。

日据时期台湾和澎湖地区民间签订土地等物产交易时的契约文书,其较为明显的形式变化有二点。一是较多地出现了土地买卖的预约定头契约文书。所谓预约定头,就是当某业主要把一块土地出卖给某买主时,由于某买主担心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可能出现纠纷,或者是无法得到日据台湾当局的认可登记,故在进行这块土地的交易时,先签订预约定头文书,并过手一定数量的交易价,而等到这宗买卖在日据台湾地方当局那里登记落实妥当后,再交足其他的交易价,正式签订杜卖文书,并完成相关的契约过户手续等。在此我们引用李氏家族李树华兄弟承买的一纸土地杜卖定头文书为例:

立杜卖尽根定头字人李奇,有自己明买过□□天助等旱田壹所,坵数不计,内带水堀通流,址在和尚洲王爷官庄。东至大路为界,西至内外塍沟为界,南至王祖田为界,北至李绪田为界,四至明白。其大租载明买契内,甲数载明丈单内。今因乏银费用,愿将此旱田进行出卖,先问至亲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招引李树华兄弟等出首承买,三面议定依时价尽根价龙银壹仟壹佰大圆正。奇即日全中亲收过定头银壹佰贰拾大圆正。保此业系是奇自己明买物业,与别人无干,自今收定头银以后,断不敢贪价别售。如有贪价别售,愿受罚小礼银陆百大圆,不敢异言。此系仁义交关,二比甘愿,各无反悔,口恐无凭,□□有据,立杜卖尽根定头字壹纸付执为据。

即日全中亲收过定头字内龙银壹佰贰拾大圆完足昭。

场见并代书人 李瑞 为中人 李坚

明治三十五年壬寅十一月 日立杜卖尽根定头字人李奇

正如上引契约文书中所明白写着,交易双方交纳接受过买卖定头银后,其他的价银,“候至本年旧历冬至前起耕立契登记明白”,也就是说已经得到官府的认可才正式生效,如果没有出现物权不清的问题,业主不能随意把这块土地再出卖给其他人。再者,从定头银的数量看,以上这二纸契约文书中地价银与定头银分别是一千一百圆比一百二十圆,五百圆比二十四圆,定头银

www.cnki.net